第 52 卷 第 6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52, No. 6
2015 年 11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v. 2015

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

编者按:哲学发源于疑惑与问题,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所开辟的哲学道路,就是以哲学方式关注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一直面向问题的;1978 年以来我国的哲学研究,成之于面向问题,失之于漠视问题。总结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学界可把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作为总体研究方向。"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既是指要善于运用哲学理论、思维和方法来分析哲学层面的重大问题,又是指要在分析解决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发展哲学。"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是一种哲学研究范式,这种哲学研究的一切活动都坚持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它是哲学研究的一种对象,是总结以往哲学研究的经验教训,且让以往各种哲学研究焕发生命力的一种根本出路,是哲学研究和哲学创新的一种方向,是真正触及哲学本质和中国本质的一种指向。本组笔谈分别探讨了现代性的开启及与之相伴随的哲学危机,当代中国消费社会问题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问题。本组笔谈以问题为导向,旨在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面向中国问题"。

重述哲学危机

侯　才
(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近代以来,伴随人借助于工业和科技的力量在总体上成为自然的主体,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转型这一根本性的历史变迁,传统社会、自然经济终结了。与此相适应,以往的哲学形式——传统的形而上学也终结了。现代性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同时其内部也蕴含和生成着深刻的危机。与现代性的开启及其危机相伴生的,是哲学主体性的莅临以及同样深刻的哲学危机。

其实,说到底,这种哲学危机与现代性危机不过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前者不过是后者的理论映现和逻辑表达。两者的同一性具体和主要表现在,现代性的存在论根基是被哲学称之为的主体性,所以,所谓现代性危机实质上是主体性的危机。

正如迄今我们仍处在现代性的危机中,迄今我们也仍处在哲学的危机中。然而,这种深刻的哲学危机尽管早已为某些富有睿智的哲学家所深刻洞察和昭示,但并未得到应有的普遍认同和有效回应,从而哲学发展的状况也就依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观。甚至随着时间的流逝,连危机本身也愈渐被淡漠、忽视和遗忘,以致在客观上成为一种人们习以为常的哲学发展的常态,乃至有必要在今天新的历史境况下对这种危机从总体上重新加以揭示和描述。

概而言之,哲学危机到底何在?笔者以为,其主要表现是:伴随人对自然的所谓主体地位的确立,主体性原则的膨胀物——"主体主义"①占据了统治地位,对作为世界之根本、本原或最高统一者的"存在"②的追寻遭到实质性的废弃,与宗教母体愈益疏离并同时沦为科学的附庸,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资本及其逻辑所支配,从而成为物欲主义、消费主义和各种实用主义的工具,丧失了本应具有的信仰、批判和超越之维,特别是丧失了将人与世界、与"存在"紧密结合、合而为一的能力。

首先,哲学危机一个首要和根本的特征,是伴随主体性的莅临而来的"主体主义"的统摄以及

① 笔者用"主体主义"一词来指谓以主体为中心、将主体性原则绝对化的各种理论形式。

② 在西方哲学中,"存在"被普遍用来表征世界之根本、本原、始源或最高统一性,本文在通行或约定俗成的意义上使用该词。

以此相联系的“存在”的失落。近代以降,主体性成熟并迅速崛起,进而取代了作为传统形而上学表征的“存在”的地位,成为哲学的普照之光。主体性莅位的现实根源是,人工的因素在知识和科技的强力支持下,开始在历史过程中占据优势和主导地位。这从广义自然的立场来看,不过是表明自然中一种有意识的自然力开始得到有效的发挥,然而从人类的立场来看,却被视为人类开始在总体上成为所谓自然的主体。如前所述,主体性是现代性的哲学内核和根基。在此意义上,现代化的进展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主体性的展开和发挥过程。现代化的业绩也就是主体性的业绩。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在带来积极的效用的同时也都会带来负产品。主体性的负产品就是主体性原则的绝对化,即主体性的膨胀物——一切以主体为中心的绝对的主体主义。正是主体性自身所含有的这种内在矛盾,决定了现代性在其诞生之日起就蕴含着危机。而且,正因为主体性是现代性的哲学内核和根基,现代化如果未彻底完成,主体性的使命就不会终结,而与其相伴随的主体主义同样也就不会寿终正寝。

与主体性的莅临相关联的是“存在”的失落。如人们所熟悉,海德格尔曾将现代哲学危机的主要表现和实质简要地归结为由于误将“存在”认作“存在者”所导致的“存在”的遗失①。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由于对“存在”问题的遗忘,才导致技术的统治,从而致使现代性陷入危机。同时也正是由于对“存在”问题的遗忘,哲学虽然并未化为乌有,但已经走到终点。鉴于传统哲学的终结,海德格尔甚至不愿再将自己的哲学指称为“哲学”,而转而称之为“另一种意义的思”。其实,在海德格尔之前,远的不论,与海德格尔同时代的某些哲学家已经提出过一些类似的洞见。例如,早在 1911 年即海德格尔完成其《存在与时间》的 15 年前,别尔嘉耶夫在其《自由的哲学》中就已对这种现代哲学的危机及其实质进行过深刻的揭示。在他看来,这种危机的表现主要是主体与客体的分裂以及“存在”本体的消失,而其实质则是“在认识存在,在把认识主体与存在结合起来方面的致命的软弱无力”②。据此,别尔嘉耶夫明确地断言并宣布:“对于哲学来说,模仿追随和衰落的时代已经到来。”③在与别尔嘉耶夫的同时,西田几多郎在同年发表的《善的研究》中,出于对 “存在”之遗失和现代哲学之衰落的焦虑,力拒“对象逻辑”即主客分裂的立场,努力重建“存在”的权威(西田几多郎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将“存在”改称和命名为“无限的实在统一力”),并且最终创制了一种立足于“历史实在世界”和诉诸“行动的直观”,而且堪与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相媲美的现代存在论体系——“场所逻辑论”。在我国,我们看到,在金岳霖民国时期所撰写的著作中,在深刻揭露现代性危机的同时,对现代哲学危机亦有深刻的揭露和描述。在金岳霖看来,在当代社会,随着目的和知识的出现,“实在”已经被分为主体的实在和客体的实在。由于人类既具有目的也具有知识,所以他们不仅要求改造客体实在,而且也知道如何不断扩大改造的范围,而他们的力量与他们所能够具有的知识成比例。正因如此,目的和知识的结合既给人提供了力量,但同时也给人带来了危险,因为它孕育着追求得到更大力量的欲望,而且并不满足于仅仅作为单纯的手段,而是具有使自己成为目的的倾向,随时会异化为目的本身。金岳霖认为,实在世界的这种主客分裂是“道”在其自我展开过程中必然经历的现象,而正是实在世界的这种主客分裂及其引起的手段的异化,导致了哲学的界域和性质的变化,使哲学再也无法担负起“智慧的源泉”的重任以及解决生活中最根本的问题的任务,失去了昔日的荣耀。鉴此,他致力重建“天人合一”的“道”本体论,诉诸和倡导一种“以超越人类作用的沉思为基础的”、能够帮助人们摆脱个人自我

① 海德格尔的这一说法严格说来并不确切。笔者认为,“存在”被遗弃的认识论根源首先在于“存在”与人及其感性世界的二重化,即“存在”被同人及其感性世界相分离。“存在”所以被误认作存在者,也是这种二重化所致。
② 别尔嘉耶夫:《自由的哲学》,董友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7 页。
③ 别尔嘉耶夫:《自由的哲学》,董友译,第 6 页。

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圣人人生观”。①

令人遗憾和失望的是,上述哲学家们的睿智和洞见,并未能实质性地扭转或改变当代哲学发展的趋向。迄今为止哲学似乎仍在沿着已经开启的固有方向无可挽回地行进下去,而人通向“存在”之路仍未被真正找到或打通。更有甚者,仍有某些哲学家相信并坚执,“存在”的失落是哲学的一种完全合理而应予肯定的发展,哲学研究没有必要再去固守和因袭旧的传统。例如,甚至哈贝马斯也明确地认为:“形而上学的解释形式在现代失去了其价值,并发生了变化,尽管它们还替理论保存着原始神话所具有的统一力量:宗教和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所依赖的整个价值体系,随着科学、道德和法律等专家文化的兴起以及艺术走向自律而崩溃了。……今天,哲学阐明正常人的知性所依据的有效性标准,已超出了哲学自身的管辖范围。哲学必须在不由它自主的理性条件下从事活动。所以,相对于科学、道德和艺术而言,作为解释者的哲学不可能再具有认识本质的特权,拥有的最多只是可能会出错的知识。哲学必须放弃其传统形式,即作为一种干预社会化过程的学说,而保留其纯理论。最终,哲学也无法再根据价值的高低,把不同生活方式的复合总体性加以等级化;哲学只能把握生活世界的一般结构。从上述三个意义上说,康德之后,不可能还有什么终极性和整合性的形而上学思想。”②据此,在哈贝马斯看来,哲学的功用在今天已经十分有限和具体了:“哲学所剩下的以及力所能及的就是通过解释把专家知识和需要探讨的日常实践沟通起来。哲学剩下的就是通过阐释来推动生活世界的自我理解进程。”③显然,当哈贝马斯对今天哲学所面临的任务做出如此规定时,已经撇开了维特根斯坦所提及的哲学必须沉默面对的生命问题:“我们觉得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能解答,我们的生命问题还是仍然没有触及。当然不再有其他问题留下来,而这恰好就是回答。人们知道生命问题的解答在于这个问题的消灭。这难道不是在长时期怀疑之后才明白生命的意义的人们还是不能说出这个意思究竟何在的原因吗?确实存在不可言说的东西。这是自己显现出来的神秘的东西。”④然而,正是生命问题与整体世界、与“存在”相联系。它的奥秘直接与整体世界、与“存在”相关联。在一定意义上,生命问题是一个整体世界及其本原的问题,对它的回答要以对整体世界、以对“存在”的回答为前提。其实,不仅生命问题与整体世界、与存在相关联,其他一切问题显然也莫不如此。

哲学危机的另一个主要表现和特征,是割断了与宗教母体的关联并沦为科学的附庸。追溯其起源,哲学原本在宗教的母腹中诞生,宗教是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文化的母体,从而也是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文化的精神源泉和营养根基。但是,到了近代,当哲学力求把握宗教信仰的普遍内容(其实,哲学在此方面所能做到的极为有限),并将其翻译和改造成思想所能掌握的意义以及通过概念形式对其予以解释,从而从宗教中独立出来以后,信仰的超自然特性和内容开始远离作为人类理性的哲学,成为哲学所不再眷注和不能理解的东西,而哲学本身则只限制在世俗感性事物的范围之内。由此,哲学也就愈渐彻底地断绝了与宗教母体的联系。

不仅如此,某些哲学家、思想家甚至认为并相信,哲学乃至道德、科学、美学等等完全可以取代和代替宗教。在此方面,黑格尔无疑最具代表性。黑格尔认为,哲学与宗教的对象、内容都是“独立自存的理性”⑤,就此而论,“哲学本身事实上就是敬神,就是宗教”⑥。而且,就形式方面而言,即就意识的抽象性程度而言,哲学的地位甚至还高于宗教。因此,他断言:被宗教所表象为意识的对

---

① 见《金岳霖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73—175、195—197、183 等页。

②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 页。

③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第 18 页。

④ 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 - Philosophicus, London, 1956, P. 186.

⑤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1 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5 年版,第 64 页。

⑥ 黑格尔:《宗教哲学讲座. 导论》,长河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8 页。

象的东西,不论是想象的作品,或是历史的存在,哲学均能够加以思维、加以把握。① 质而言之,哲学完全有资格取代宗教。实际上,一般而论,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不仅形式相异,而且,对象和内容亦不同。“上帝”的底蕴在于,他不仅是世俗的统一性,而且还是超世俗的统一性。也就是说,是世俗与超世俗的共同统一性。而黑格尔所描述的所谓的“自在自为的理性”或“最高理念”,实际上,归根到底仍然是一种世俗的统一性。尽管黑格尔批判康德在知识与信仰之间划定了界限,限制了理性的能力和哲学的范围,然而黑格尔自己所诉诸的理性实际上依然无法企及彼岸的世界。因此,即使单纯就对象、内容而言,哲学也是无法取代宗教的。事实上,当黑格尔偶尔流露出“宗教的对象不是地上的、世间的,而是无限的”②,而“哲学的思维仅只是世间的智慧,人间的工作”③等这样的感叹时,不啻自我宣布了这种取代论的悖论和破产。而且,宗教的形式既然是特殊的,是异于哲学等其他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因此也就具有其存在的根据和合理性,是哲学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意识形式所不能代替的。应该承认,宗教把握世界的方式是不同于哲学把握世界的方式的。前者诉诸的主要是信仰,而后者诉诸的则主要是理性。信仰诉诸情感和超常经验④,理性则诉诸概念、判断和推理。在理性与信仰之间并不存在实质的同构性:信仰是无须理性论证和证明的,也是理性所不能论证和证明的。在这一点上,康德对理性所持的见解和立场显然仍是不可逾越的。黑格尔所推崇的安瑟伦将信仰理性化的努力,其实是对宗教本质的误判,是哲学对宗教的僭越。

与脱离宗教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哲学自身的科学化、实证化和知识化。近代以后,哲学的一个重大趋向是哲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和知识化。这一方面表现在由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建立而引起的各门具体实证科学与哲学的分离,以及实证科学通过为哲学提供实证性基础而愈益对哲学发生影响;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哲学自身对客观性、实证性、规律性、精确性等科学观念和科学精神的认同和追求。在这种情势之下,哲学愈来愈被科学之光所笼罩。科学性逐渐成为各门学科并且最后也成为哲学学科的合法性的根据和完善性的标尺。哲学家们也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哲学的科学化作为哲学理论活动的主旨。哲学的科学化固然减轻了哲学的重负,为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实证性的基础和依据,抑制了哲学的臆造和玄想的倾向,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哲学对科学的依赖以及科学观念、科学精神对哲学本性的过深浸润和消解。由此,哲学的性质、界域、内容和功能等均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哲学的科学性方面被片面地发展了,哲学的统一本性遭到了分解,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被隶属于科学,甚至沦为科学主义的奴婢和工具。

哲学的知识化无疑是哲学科学化的一个重要表现。金岳霖曾经特别提请人们注意这一事实:在当代,整个哲学领域都是为了理解或者说是为了追求知识而构建起来的,哲学开始成为“从进行理解和获得知识出发而建构起来的哲学”⑤。知识固然具有其优点,即具有有用性。但是,也正如金岳霖所深刻指出的,知识也有其天然的局限:“知识是否是某种意义上的美德?古希腊人认为是,我们无须断言它在今天已经不是了。知识是中性的,影响不了我们的爱好和口味;它的分寸感太强,使我们不能靠它来解决它的恰当范围以外的问题;它太外在,不能支持我们以信仰来行动;它太软弱,不能为我们提供帮助,它不是情感和欲望的主宰或伙伴,相反,它成了它们的奴隶。”⑥哲

---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1 卷,贺麟、王太庆译,第 75 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1 卷,贺麟、王太庆译,第 62 页。
③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1 卷,贺麟、王太庆译,第 66 页。
④ 如《大智度论》卷三十八所载龙树论人死非断的经验证明必须具备“天眼”和“宿命通”:“以天眼了见故,知有前生来世”,“由宿命通知必有前生后世”。
⑤ 《金岳霖集》,第 197 页。
⑥ 《金岳霖集》,第 201 页。

学的知识化在哲学的专业化、职业化和产业化等多方面得到体现。就专业化而言,学科分化日益繁多,每一细小学科、分支乃至专业方向都构成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地。另外,分工日益细密,以至每一独特领域的研究者都难以取得对其他专门领域的学术发言权。于是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在众多的十分专门的哲学领域内可以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哲学专家,但唯独涌现不出哲学家。就职业化而言,哲学对于绝大多数研究主体来说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已变成一种谋生、就业的行当,而这种行当由于其自身规则的制约,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外在于他的生活,与他的实际生活相分离。这样一来,哲学也就仅仅具有单纯知识的性质和功用,而不再是哲学与哲学家本人合而为一的“为己之学”。就产业化而言,哲学作为一种知识已在某种程度上或范围内被纳入到市场经济体系中,按照市场的需要来生产、定制,沦为文化消费的对象。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它也就自然被直接纳入到资本逻辑的统摄之下。

愈益密切的与资本及其逻辑发生纠葛,显然是哲学危机的最新征象。其实,哲学与资本原本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资本是借助于主体性而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的。主体性是现代性的哲学底蕴,从而也是资本的哲学底蕴。就此而论,主体性原则的绝对化、主体性的恶性膨胀以及主体主义的统治实质上是资本逻辑的表达。反过来说,资本逻辑实质上则是主体性原则的绝对化、主体性的恶性膨胀以及主体主义的统治的实现和现实。我国目前仍处在市场经济的完善和有待充分发展的阶段。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物欲经济”,是资本的统治和主宰的舞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其历史初期,这导致了致富欲和贪欲的绝对统治。在我国现阶段,虽然由于社会制度和国情的不同,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运行方式受到了一定的规制和改变,但资本的本性和运行逻辑却不会改变。加之某些体制和环节的缺失,以及后发国家所独具的某些先天不足和劣根性,特别是蓄之已久的速欲改变现存生活状况和致富的社会心理,势必导致现阶段社会上所普遍盛行的物欲主义、功利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可以说,这是一个从未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空前的物欲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时代。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中,哲学显然难以避免资本本性的侵染和物欲主义、功利主义的诱惑,从而失去宁静之心,减弱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以及洞察力、穿透力和前瞻性。

上述种种状况表明,哲学在今天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本己性和个性,甚至已经丧失了关于本己性和个性的自我感觉。人们再也寻觅不到清晰的自明的哲学本己性和个性了。由此,也就提出了重建哲学这一根本性的任务和课题。

哲学与当代中国的消费社会问题

王 纵 横

(中共中央学校哲学部讲师)

消费社会是消费主义的社会逻辑,它具有两层含义:其一,消费社会是一种理论,其旨在用消费而非生产来理解人类社会,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传播学等领域;其二,消费社会是一种社会景观,其中消费成为社会发展运动的推动力量,亦是社会发展与人类生活的直接目的,它的现实指向是北美、西欧以及环太平洋地区的发达国家,用于区别 19 世纪以来的“生产社会”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形态。

最早在现代意义上讨论消费问题的学者可以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资本、法权与人的首先自觉研究”(15CXZ011)阶段性成果。